

孔子对黄帝形象的“述作”及其重要历史意义

陶广学

(信阳师范大学 文学院,河南 信阳 464000)

摘要:据先秦诸多文献可知,孔子之“述”古史可上溯至黄帝时代。孔子传述“黄帝三百年”“黄帝四面”“夔一足”,以及“蚩尤作兵”等事例,按照“人格形象”对黄帝等“神格形象”进行积极改造,将神话的黄帝、夔、蚩尤改造为历史的黄帝、夔、蚩尤。梳理相关文献可知,孔子通晓黄帝等古圣王事迹的途径有勤学好问与游学考察两种,也表明黄帝事迹等早在春秋时代即广为流传。孔子对黄帝形象的“述作”,立足于儒家宗法观念,将黄帝塑造为华夏民族的始祖,体现了“天下一家”的民族认同观;依据道德品质和历史功绩,将黄帝塑造为远古圣王,为后世君主树立了治平天下之榜样。

关键词:孔子;黄帝;述作;《大戴礼记》

OSID:



中图分类号:G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964(2023)04-0107-08

孔子自谓“述而不作,信而好古”,所谓“述作”,《礼记·乐记》的表述尤为明确:“知礼乐之情者能作,识礼乐之文者能述。作者之谓圣,述者之谓明。明圣者,述作之谓也。”孔颖达《正义》疏解极为详尽,择其要曰:“圣者通达物理,故作者之谓圣。”“明者辨说是非,故修述者之谓明”^{[1]1477}。孔子的“述而不作”,实为一种“寓作于述”的学术整理:“这种‘作’不是从无到有的创造,而是深深植根于传统的‘作’。也就是说,他是通过‘述’而‘作’的。”^[2]孔子以“述作”方式自觉承继先王之道,“治《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以奸者七十二君,论先王之道而明周召之迹”^{[3]531}。《史记·孔子世家》对孔子“述作”之功多有赞誉,认为其“序《书传》”、删《诗》、“序《彖》《系》《象》《说卦》《文言》”等^{[4]1935-1937}。《汉书·儒林传》全面论述了孔子的“述作”:“叙《书》则断《尧典》,称乐则法《韶舞》,论《诗》则首《周南》。缀周之礼,因鲁《春秋》,举十二公行事,绳之以文武之道,成一王法,至获麟而止。盖晚而好《易》,读之韦编三绝,而为之《传》。皆因近圣之事,以立先王之教,故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5]3589}认定“六经”皆孔子删定,高度总结其“述作”之功。

一、孔子对黄帝形象的“述作”

《中庸》曰“仲尼祖述尧舜,宪章文武”^{[1]2043},指出孔子所“述作”之“圣”,主要指尧、舜、文、武等圣王,与孔子多次赞誉尧、舜、禹、文、武相合,仅以《论语·泰伯》为例,子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与焉。”子曰:“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荡荡乎!民无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焕乎!其有文章。”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武王曰:“予有乱臣十人。”孔子曰:“才难,不其然乎?唐虞之际,于斯为盛。有妇人焉,九人而已。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谓至德也已矣。”子曰:“禹,吾无间然矣。菲饮食,而致孝乎鬼神;恶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宫室,而尽力乎沟洫。禹,吾无间然矣。”司马迁亦曰,孔子“追迹三代之礼,序《书传》,上纪唐虞之际,下至秦缪”^{[4]1935}。孔子如此推崇尧舜,导致后世有“到了孔子时有尧舜”之说^{[6]59-66}。综合考察《山海经》《周易·易传》《左传》《国语》《大戴礼记》《礼记》《尸子》《庄子》《韩非子》《吕氏春秋》《孔子家语》《孔丛子》等典籍,并结合相关出土文献可知,孔子所“述作”古史实可上溯至五帝之首的黄帝时代。黄帝等古圣王的事迹与伟业得以彰显于后

收稿日期:2023-03-10;**修回日期:**2023-05-10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特别委托项目(18@ZH003);河南兴文化工程文化研究专项项目(2022XWHWT25)

作者简介:陶广学(1976—),男,河南固始人,文学博士,副教授,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文学及炎黄文化研究。

世,尤其得益于孔子之“述作”及其弟子之再“述作”。例如,《大戴礼记·武王践祚》《五帝德》《帝系》《虞戴德》等篇记载黄帝等五帝事迹,其中三篇皆系孔子“述作”:《虞戴德》系《孔子三朝记》,记孔子答鲁哀公问,《五帝德》《帝系》系孔子“所传宰予问”^{[4]46},足见孔子整理、传播黄帝等五帝文献的重要作用。黄帝作为圣王之代表与华夏民族之始祖的历史形象的确立,实与孔子有着莫大关系。高强对散见于先秦以来文献之中的炎黄二帝材料进行分析,认为“炎黄形象分为人格和神格两大系统”^[7]。孔子对“黄帝三百年”“黄帝四面”“夔一足”以及“蚩尤作兵”的传述,即按照“人格形象”对黄帝、夔、蚩尤等“神格形象”进行积极改造,将神话人物改造为历史人物,神格的黄帝从而成为人格的黄帝。孔子的“述作”,奠定了黄帝华夏人文始祖与儒家古圣王的形象。

(一) 传述“黄帝三百年”

《五帝德》记宰我闻荣尹令“黄帝三百年”说,遂以黄帝“人邪”“亦非人邪”发问孔子。王聘珍解诂曰:“荣尹,人姓名,《书序》有荣伯。马注云:‘荣伯,周同姓畿内诸侯,为卿大夫也。’《周语》有荣夷公,韦注云:‘荣,国名。’《周书·王会》有荣氏,以国为氏族者也。令,教言也。”^{[8]117}可知“黄帝三百年”说,出自权威的官方教令。孔子起初试图回避其问,在宰我的一再坚持下,方予以正面回答,同时对黄帝的事迹加以“述作”:

黄帝,少典之子也,曰轩辕。生而神灵,弱而能言,幼而慧齐,长而敦敏,成而聪明。治五气,设五量,抚万民,度四方;教熊黑貔豹虎,以与赤帝战于阪泉之野,三战然后得行其志。黄帝黼黻衣,大带黼裳,乘龙扈云,以顺天地之纪,幽明之故,死生之说,存亡之难。时播百谷草木,故教化淳鸟兽昆虫,历离日月星辰,极畋土石金玉,劳心力耳目,节用水火材物。生而民得其利百年,死而民畏其神百年,亡而民用其教百年,故曰三百年。^{[8]117-118}

孔子盛赞黄帝的聪慧超群与丰功伟绩:治理五行,制定度量衡,安抚民众,测量四方;训练猛士,征服赤帝;顺应天地四时规律,推测阴阳之变,阐释生死之理,论述存亡之因;按时播种百谷草木,教化遍及鸟兽昆虫,以历法辨别日月星辰,开采土石金玉,节用水火材用。众多成就对个人来说难以实现,对于一个部落或民族来说,历史地看,亦非神话。“黄帝时之制作,或恃前人之经验,或赖多士之分工,万物并兴,实非一手一足之烈”^{[9]14}。此与文献对黄帝诸多制作的记载相似。《五帝德》曰黄帝“乘龙扈云”,又曰颛顼“乘龙而至四海”、帝喾“春夏乘龙,秋

冬乘马”、帝尧有“龙夔教舞”^{[8]120-121}。《左传》昭公二十九年(公元前533年),蔡墨曰:“古者畜龙,故国有豢龙氏,有御龙氏。”^{[10]2122}孔广森《大戴礼记补注》引《周礼·夏官司马》廋人职“马八尺以上为龙”为释^{[11]129}。既然龙马并举、又可豢养,则龙当系马之优者无疑。而“扈云”盖与云瑞相关,“黄帝氏以云纪”^{[10]2083},其“百官以云命名,恐怕也是和农业气象有关”^{[12]7}。自“黄帝,少典之子”至“三战然后得行其志”,被司马迁《史记·五帝本纪》采用。所谓“生而神灵,弱而能言,幼而慧齐,长而敦敏,成而聪明”。张守节《正义》:“言神异也。《易》曰‘阴阳不测之谓神’,《书》曰‘人惟万物之灵’,故谓之神灵也。”司马贞《索隐》:“弱谓幼弱时也。盖未合能言之时而黄帝即言,所以为神异也。”“言黄帝幼而才智周遍,且辩给也”。张守节又云:“成谓二十冠,成人也。聪明,闻见明辩也。”^{[4]2-3}

黄帝生时民众受其利百年,逝后民众敬其神百年,而后民众又受教化百年,故谓“黄帝三百年”。《列子·黄帝》言黄帝梦游华胥国,得治天下之道,“又二十有八年,天下大治,几若华胥氏之国,而帝登假,百姓号之,二百余年不辍”^{[13]43}。言黄帝逝后,天下延续二百年太平,加在世一百年,即三百年,与孔子传述“三百年”甚合。《大戴礼记·盛德》曰:“夫民善其德,必称其人,故今之人称五帝三王者,依然若犹存者,其法诚德,其德诚厚。”^{[8]146}贾谊曰:“古者五帝皆逾百岁……因生为明帝,没则为明神,名誉之美垂无穷耳。”^{[14]29}皆得孔子思想精髓。

(二) 传述“黄帝四面”

孔子传述“黄帝四面”,今见于清人汪继培辑本《尸子》卷下第28条:“子贡问孔子曰:‘古者黄帝四面,信乎?’孔子曰:‘黄帝取合己者四人,使治四方,不谋而亲,不约而成,大有成功,此之谓四面也。’”^{[15]18}子贡言“黄帝四面”,本指黄帝有四张脸,否则不会疑惑而问。孔子借“四面”将黄帝传述为知人善任、治理四方的圣君。如汪继培所言,《尸子》“其书原本,先民时有窃取;后出诸子,又或餐挹其中,传相蹈袭”^{[15]1},其后言“黄帝四面”者,大体以此为据而有所发挥。汪继培曰:

《吕氏春秋·本味篇》云:“贤主之求有道之士,无不以也;有道之士求贤主,无不行也,相得然后乐。不谋而亲,不约而信,相为殫智竭力,犯危行苦,志欢乐之,此功名所以大成也。故黄帝立四面,尧舜得伯阳、续耳,然后成。”高诱注:“黄帝使人四面出求贤人,得之立以为佐,故曰立四面也。”《臣轨·同体章》云:“轩辕氏有四臣,以察四方。故《尸子》云:‘黄帝

四目。”“目”字疑误。《魏志》黄初六年注,《魏略》载诏曰:“昔轩辕建四面之号。”^{[15]18}

另外,《淮南子·天训篇》曰:“中央,土也,其帝黄帝,其佐后土,执绳而制四方。”^{[16]186}“执绳而制四方”即上承孔子“取合己者四人,使治四方”说。1972年,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出土的《孙子兵法》,其中《黄帝伐赤帝》曰:“黄帝南伐赤帝,至于□□。”“东伐□帝,至于襄平。”“北伐黑帝,至于武遂。”“西伐白帝,至于武刚。”“已胜四帝,大有天下,暴者……以利天下,天下四面归之”^{[17]101}。王小盾认为,“这里说的四面征伐、四面归化,应该就是四面形象的内涵”^{[18]333}。

上古关于多面人(神)之说,并非绝无仅有。《山海经·大荒西经》言“三面人”:“大荒之中有山,名曰大荒之山。……有人焉,三面,是颙顼之子,三面一臂。三面之人不死。”^{[19]348}1973年,湖南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佚书《黄帝四经》,其中《十大经·立命》篇曰:“昔者黄宗质始好信,作自为象,方四面,傅一心,四达自中,前参后参,左参右参,践立(位)履参。是以能为天下宗。”“黄宗”即黄帝,“方四面,傅一心,四达自中,前参后参,左参右参,践立(位)履参”,陈鼓应曰:“此五句皆以黄帝之先天形貌比况其类天地之形,得天地之正。……‘方四面’,传说黄帝前后左右(‘方’)均有面目(‘四面’)。”^{[20]196-197}1959年,湖南宁乡出土的商代“大禾鼎”,“器身四周为浮雕的四个人面装饰”^[21],饶宗颐先生即认为“此器即象征黄宗四面”^{[22]131}。以上皆与子贡“黄帝四面”说相合,可证子贡所言绝非空穴来风,孔子传述则系有意改造。

孔子答弟子宰予、子贡之问,“分别从空间(黄帝四面)和时间(黄帝三百年)两个维度对黄帝传说进行了人格化式的解析”^[23]。孔子解说“夔一足”和“蚩尤作兵”,则是回答鲁哀公之问。

(三) 传述“夔一足”

最早记载孔子言夔事见于《国语·鲁语下》“季桓子穿井获如土缶”条:“丘闻之:木石之怪曰夔、罔蜃,水之怪曰龙、罔象,土之怪曰豸羊。”^{[24]191}而在《礼记·仲尼燕居》中,孔子直言夔为“达于乐”之“古之人”:“子贡越席而对曰:‘敢问,夔其穷与?’子曰:‘古之人与?古之人也,达于礼而不达于乐,谓之素;达于乐而不达于礼,谓之偏。夫夔,达于乐而不达于礼,是以传此名也,古之人也。’”郑玄注曰:“夔达于乐,传世名,此贤人也。非不能,非所谓穷。”^{[1]1936}孔子不仅以夔为“人”,还誉之为“贤人”,完全人格化了。至于孔子解答“夔一足”,较早见于《韩非子·外

储说左下》,有两说:

鲁哀公问于孔子曰:“吾闻古者有夔一足,其果信有一足乎?”孔子对曰:“不也,夔非一足也。夔者忿戾恶心,人多不说喜也。虽然,其所以得免于人害者,以其信也。人皆曰:‘独此一,足矣。’夔非一足也,一而足也。”哀公曰:“审而是,固足矣。”

一曰:哀公问于孔子曰:“吾闻夔一足,信乎?”曰:“夔,人也,何故一足?彼其无他异,而独通于声。尧曰:‘夔一而足矣。’使为乐正。故君子曰:‘夔有一,足。’非一足也。”^{[25]320-321}

前者言夔“忿戾恶心,人多不说喜”,只因有“信”这一品质,人不害之。“夔一足”,意即夔有诚信这一品质得到认可,孔子借此强调诚信之可贵。后者曰“独通于声”,言夔擅长音乐这一技能,尧认为其足以胜任乐正之职。“夔一足”,意即夔一人足以胜任。要之,二者解说“一足”皆与腿脚无关。《尚书·舜典》:“帝曰:‘夔,命汝典乐,教胥子。……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夔曰:‘于!予击石拊石,百兽率舞。’”^{[26]131}与夔任乐正之职甚合,只是任命者是舜而非尧。

孔子传述“夔一足”又见于《吕氏春秋·察传》《孔丛子·论书》。《察传》中孔子的回答,增加了舜令重黎举荐夔、夔施行乐教、舜论乐教意义并表彰夔三项内容,具有“层累地造成的古史”^{[6]59-66}的特点:“昔者舜欲以乐传教于天下,乃令重黎举夔于草莽之中而进之,舜以为乐正。夔于是正六律,和五声,以通八风。而天下大服。重黎又欲益求人,舜曰:‘夫乐,天地之精也,得失之节也。故唯圣人为能和乐之本也。夔能和之,以平天下,若夔者一而足矣。’”^{[27]1536}《论书》所记更为“翔实”,由鲁哀公、孔子论《尚书·舜典》引发“夔一足”之问答^{[28]21-22},脉络清晰,“层累”痕迹愈加明显。

而刘起舒认为,《山海经》中作为“一种神兽”的夔,是其最初形象:“特点是一足;皮为鼓,而鼓是重要乐器。”并曰“这两点影响它进入史籍中的形象”^{[29]281}。《大荒东经》云:“东海中有流波山,入海七千里,其上有兽,状如牛,苍身而无角,一足。出入水则必风雨,其光如日月,其声如雷,其名为夔,黄帝得之,以其皮为鼓,橛以雷兽之骨,声闻五百里,以威天下。”袁珂曰:“流波山一足夔神话亦黄帝与蚩尤战争神话之一节。《绎史》卷五引《黄帝内传》云:‘黄帝伐蚩尤,玄女为帝制夔牛鼓八十面,一震五百里,连震三千八百里。’吴任臣《山海经广注》引《广成子传》云:‘蚩尤铜头啖石,飞空走险,以犛牛皮为鼓,九击止之,尤不能飞走,遂杀之。’即其事也。”^{[19]307-308}《中

次九经》又载有“夔牛”：“又东北三百里，曰岷山，……其兽多犀、象，多夔牛。……又东一百五十里，曰岷山……其兽多夔牛……”^{[19]145-146}至两汉学者仍以夔为“一足”神兽，如《说文》“夔，即魑也。如龙，一足，从夂。象有角、手、人面之形”^{[30]233}。由此，愈发可见孔子于传述之中进行了改造。

(四) 传述“蚩尤作兵”

孔子对黄帝的对立者之一蚩尤的传述，首见于《大戴礼记·用兵》：“公曰：‘古之戎兵，何世安起？’子曰：‘伤害之生久矣，与民皆生。’公曰：‘蚩尤作兵与？’子曰：‘否。蚩尤，庶人之贪者也，及利无义，不顾厥亲，以丧厥身。蚩尤愎欲而无厌者也，何器之能作！……人生有喜怒，故兵之作，与民皆生，圣人利用而弭之，乱人兴之丧厥身。’”^{[8]209-210}孔子认为，蚩尤是一个贪得无厌、见利忘义之辈，最终众叛亲离，因利丧身，其德不配制作。并指出：“兵器因人之喜怒引发争斗而产生，圣人用之消弭祸乱，贼人兴兵而丧身。”《吕氏春秋·孟秋纪·荡兵》承袭此说：“人曰‘蚩尤作兵’，蚩尤非作兵也，利其械矣。未有蚩尤之时，民固剥林木以战矣，胜者为长。”^{[27]388}

“蚩尤作兵”其说甚古。《山海经·大荒北经》记黄帝战蚩尤颇详：“蚩尤作兵伐黄帝，黄帝乃令应龙攻之冀州之野。应龙蓄水，蚩尤请风伯、雨师，从大风雨。黄帝乃下天女曰魑，雨止，遂杀蚩尤。”袁珂曰：“盖炎黄斗争、炎帝兵败，蚩尤奋起以与炎帝复仇也。”^{[19]362-363}《世本·作篇》曰“蚩尤作兵，蚩尤以金作兵器”，宋衷注云“蚩尤，黄帝臣也”，又云“蚩尤，神农臣也”^{[31]87}；或曰“蚩尤作五兵，戈、矛、戟、酋矛、夷矛，黄帝诛之涿鹿之野”^{[31]483}。皆将兵器发明归之于蚩尤名下，孔子否定“蚩尤作兵”，恰恰体现了儒家唯有圣人制作的思想。

总之，孔子看似“不语怪力乱神”（《述而》），实则借助“述中有作”，直接参与了对远古神话的改造。其传述黄帝的形象，本质上在于将神话中的黄帝改造为历史中的黄帝。孔子传述“夔一足”将其改造为贤臣形象，将蚩尤传述为利欲熏心、众叛亲离之“乱人”，与将黄帝塑造成的圣王形象相一致。

二、孔子通晓黄帝事迹的途径

以“炎黄”为代表的三皇五帝，长期以来被视为神话传说，其根本原因在于年代久远而又苦于文献不足，所谓“太古之事灭矣，孰志之哉？三皇之事，若存若亡；五帝之事，若觉若梦；三王之事，或隐或显，亿不识一”^{[13]234}。孔子亦尝感叹，言夏商二代之礼，杞宋二国“文献不足”为证：“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

足则吾能征之矣。”郑玄曰：“献，犹贤也。我不以礼成之者，以此二国之君文章贤才不足故也。”^{[32]2466}孔子时代，关于黄帝等的“文章”固然不足，但以此判定孔子不曾阅览过相关文献或听闻其事迹，则显得武断了。《礼记·礼运》：“孔子曰：‘大道之行也，与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郑玄注曰：“大道，谓五帝时也。”“志，谓识古文”。孔颖达疏曰：“此一经孔子自序，虽不及见前代，而有志记之书，披览可知。”^{[1]874-877}郑注、孔疏训“志”为“识古文”“志记之书”，与《孔子家语·礼运》甚合：“昔大道之行，与三代之英，吾未之逮也，而有记焉。”^{[33]80}明言孔子尝阅读记载五帝、三王之典，更何况当时还有一些能口述夏商以上古史之“贤才”。孔子通晓黄帝事迹的途径在于勤学好问与游学考察。

(一) 勤学好问，转益多师

孔子尝自谓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学也”，又曰“三人行，必有我师焉”。关于孔子勤学好问，文献多有记载：《礼记·曾子问》《孔子家语·观周》《庄子·天运》《吕氏春秋·当染》《史记·孔子世家》《老子传》等，皆言孔子问礼于老聃；《礼记·乐记》《孔子家语·观周》言孔子访乐于苌弘；《韩诗外传》《孔子世家》载孔子学琴于师襄；《左传》记孔子问官于郯子；等等。司马迁《史记·仲尼弟子列传》罗列孔子所师事者曰：“孔子之所严事：于周则老子；于卫，蘧伯玉；于齐，晏平仲；于楚，老莱子；于郑，子产；于鲁，孟公绰。”^{[4]2186}诸人亦即《五帝德》中孔子所谓“先生难言之”的“先生”。孔子问学，关乎黄帝者有三个方面。

1. 问官于郯子

郯子系少皞后裔，《左传》昭公十七年（公元前525年）：“秋，郯子来朝，公与之宴。昭子问焉，曰：‘少皞氏鸟名官，何故也？’郯子曰：‘吾祖也，我知之。昔者黄帝氏以云纪，故为云师而云名；炎帝氏以火纪，故为火师而火名；共工氏以水纪，故为水师而水名；大皞氏以龙纪，故为龙师而龙名。我高祖少皞摯之立也，凤鸟适至，故纪于鸟，为鸟师而鸟名……’仲尼闻之，见于郯子而学之。既而告人曰：‘吾闻之：天子失官，学在四夷。’犹信。”杜预集解曰：“黄帝受命有云瑞，故以云纪事。百官师长皆以云为名，号缙云氏，盖其一官也。”“炎帝……亦有火瑞，以火纪事，名百官”^{[10]2083}。郯子之言与《周礼·春官宗伯》所记甚合：“外史掌书外令，掌四方之志，掌三皇五帝之书，掌达书名于四方。”^{[34]820}周室本有学者掌三皇五帝典章制度，后“天子失官”，学者散失四方，郯子即是此类学者或后裔。

2. 问礼于老聃

《孔子家语·五帝德》《五帝》二篇载五帝事,据《五帝》载:“季康子问于孔子曰:‘旧闻五帝之名,而不知其实,请问何谓五帝?’孔子曰:‘昔丘也闻诸老聃曰:“天有五行:水火金木土。分时化育,以成万物,其神谓之五帝。”古之王者,易代而改号,取法五行。……是以太皞配木,炎帝配火,黄帝配土,少皞配金,颛顼配水。’”^{[33]65}此与《礼记·月令》《淮南子·天文训》皆以太皞、炎帝、黄帝、少皞、颛顼为五帝,是不同于《五帝德》的又一五帝系统。

《论语·颜渊》载季康子两次问政于孔子,又尝因“患盗”问孔子。此问五帝之事,亦非空穴来风。所谓“昔丘也闻诸老聃曰”,五帝盖是问礼老聃之具体话题。《曾子问》孔子言及问礼老聃,四曰“吾闻诸老聃曰”,与此相似。《庄子·天运》言子贡借孔子之名拜见老聃论三皇五帝之治:“子贡曰:‘夫三皇五帝之治天下不同,其系声名一也。而先生独以为非圣人,如何哉?’……老聃曰:‘小子少进,余语汝三皇五帝之治天下:黄帝之治天下,使民心一,民有其亲死不哭而民不非也。尧之治天下,使民心亲。民有为其亲杀其杀而民不非也。舜之治天下,使民心竞。民孕妇十月生子,子生五月而能言,不至乎孩而始谁,则人始有夭矣。禹之治天下,使民心变,人有心而兵有顺,杀盗非杀人,人自为种而天下耳。……余语汝:三皇五帝之治天下,名曰治之,而乱莫甚焉。’”^{[3]626-527}实由孔子拜访老聃事引发而来,《庄子》借以评判三皇五帝之治违背人之天性。

3. 求《书》于帝魁

帝魁,黄帝玄孙。言孔子求《书》于帝魁,出自纬书。孔颖达《尚书正义》疏《尚书序》:“郑作《书论》,依《尚书纬》云:‘孔子求《书》,得黄帝玄孙帝魁之《书》,迄于秦穆公,凡三千二百四十篇,断远取近,定可以为世法者百二十篇,以百二篇为《尚书》,十八篇为《中候》。’”^{[26]115}《尚书纬》系汉代学者依托《尚书》而作,以神学附会儒经,或不足信,聊备一说。

另据《左传》僖公二十五年载曰:“使卜偃卜之,曰:‘吉。遇黄帝战于阪泉之兆。’公曰:‘吾不堪也。’对曰:‘周礼未改,今之王,古之帝也。’”晋文公与卜偃对话的大意是:文公自以为己当此兆,谓“黄帝”指己,故云“吾不堪也”。卜偃则指出,黄帝战阪泉之兆乃指周襄王与子带之争(据《晋语四》,黄帝与炎帝本是同母兄弟,亦犹襄王与子带为同母兄弟)^{[35]368}。此言“黄帝战于阪泉”,《五帝

德》言黄帝“与赤帝战于阪泉之野,三战然后得行其志”甚合。晋文公助周襄王平定王子带之乱,如此重大历史事件,孔子理应知晓。

(二) 游学考察, 观周明堂

在鲁昭公时,孔子访问周室,对其思想学说产生深刻影响的主要有拜访老聃、苌弘等先贤与考察周天子“郊社之所”“明堂之则”“庙朝之度”等^{[33]29}。《孔子家语·观周》曰:“孔子观乎明堂,睹四门墉有尧舜之容,桀纣之象,而各有善恶之状、兴废之诫焉。又有周公相成王,抱之负斧扆,南面以朝诸侯之图焉。孔子徘徊而望之,谓从者曰:‘此周之所以盛也。夫明镜所以察形,往古者所以知今。人主不务袭迹于其所以安存,而忽怠所以危亡,是犹未有以异于却走而欲求及前人也,岂不惑哉!’”^{[33]29}《观周》言上古有用图形圣王与暴君以激励或警示后世君主之法,以相关文献佐证,其说可信。而且周室明堂四门墉图像应不止尧舜等6人。《论语·八佾》载,“子入太庙,每事问”。包咸曰:“太庙,周公庙。孔子仕鲁,鲁祭周公而助祭也。”邢昺疏:“‘每事问’者,言太庙之中,礼器之属,每事辄问于令长也。”^{[32]24467}由此可想象出,孔子考察周天子明堂、宗庙之际“每事问”之情形。

孔子晚年思慕周公成梦,叹曰:“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述而》)梦中周公形貌,想来应与周室明堂图像相仿。周室明堂既然有周公、成王图像,按常理更应有文武和太祖后稷图像。《观周》又曰“孔子观周,遂入太祖后稷之庙”^{[33]29},《礼记·王制》曰“天子七庙,三昭三穆,与太祖之庙而七”,郑玄注:“此周制。七者,太祖及文王、武王之祧,与亲庙四。”^{[1]516}《说文》曰“庙,尊先祖貌也”^{[30]436}。《释名·释宫室》曰“庙,貌也。先祖形貌所在也”^{[36]85}。后稷、文武系不祧之祖,理应有图像。《孔子世家》记孔子学琴于师襄,因体悟《文王操》内涵而想象文王之情貌:“有所穆然深思焉,有所怡然高望而远志焉。曰:‘丘得其为人,黯然而黑,几然而长,眼如望羊,如王四国,非文王其谁能为此也!’师襄子辟席再拜,曰:‘师盖云《文王操》也。’”^{[4]1925}可知文王其人,肤色深黑、体态修长而目光深邃。若孔子、师襄子从未见过文王图像,恐怕难有如此感悟。

至于黄帝图像,《古本竹书纪年·五帝》篇曰:“黄帝既仙去,其臣有左彻者,削木为黄帝之像,帅诸侯朝奉之。”^{[37]2}《竹书纪年统笺》曰黄帝“龙颜有圣德”^{[38]13}。虽只言片语,亦说明黄帝事迹及形貌,起码在春秋战国时代有所流传。《观周》曰太祖后

稷之庙,“堂右阶之前有金人焉,三缄其口,而铭其背曰”^{[33]29},并录有铭文一篇。《汉志》载有“《黄帝铭》六篇”,王中江认为:“即便不将《金人铭》简单看成是黄帝直接创作的,但不能排除其谦卑、谨慎的思想同黄帝之间的关联”^{[39]74}。周人姬姓,以黄帝后裔自居,周室明堂录有《黄帝铭》,图形其像极其可能。

关于中国文字起源与图画之关系,郑樵《通志·六书略·象形第一》曰:“书与画同出,画取形,书取象,画取多,书取少。”^{[40]234}《图谱略·索象》又曰:“古之学者为学有要,置图于左,置书于右,索像于图,索理于书。”^{[40]1825}唐兰曰:“旧石器时代的人类,已经有很好的绘画,这些画大抵是动物跟人像,这是文字的前驱。”又曰:“文字本于图画,最初的文字是可以读出来的图画,但图画却不一定能读。”^{[41]49-50}以上诸说可辅证孔子及其弟子,尝观览过黄帝等古圣人之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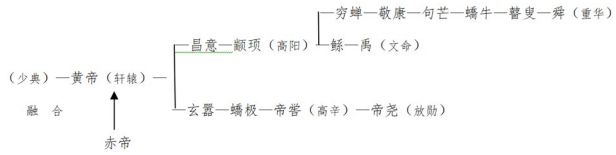
另外,时人认为孔子与黄帝形似。《孔丛子·嘉言》记孔子见衺弘,后者遂向刘文公言孔子曰:“吾观孔仲尼,有圣人之表,其状河目而隆颡,黄帝之形貌也;修肱而龟背,其长九尺有六寸,成汤之容体也。”^{[28]1}黄怀信结合《观周》《乐记》《孔子世家》《左传·昭公二十三年》等认为:“衺弘见孔子而语刘文公孔子形貌,完全可能。衺弘称‘吾观孔仲尼有圣人之表’,说明他对孔子体表形貌有过仔细观察。”^{[42]169-1755}说明黄帝事迹及形貌在春秋时代流传较广,否则不会用来参照世人形貌。孔子即使未亲见其图,由前贤口述获悉一二实为正常。纬书《龙鱼河图》还记载黄帝图形劼敌蚩尤威慑天下:“黄帝遂画蚩尤形象以威天下,天下咸谓蚩尤不死,八方万邦皆为弭服。”^{[43]374}虽不足为信,但其事当由黄帝画像生发而来。

三、孔子“述作”黄帝形象的历史意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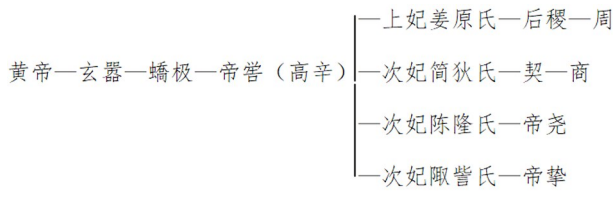
日本人盐谷温认为“中国神话之所以仅存零星”的原因之一,就是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等实用为教,不欲言鬼神,太古荒唐之说,俱为儒者所不道,故其后不特无所光大,而又有散亡”^{[44]23-24}。由孔子改造黄帝、夔、蚩尤等形象,亦可见一斑。《礼记·表記》曰:“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1]2079}与殷商重鬼神不同,周人以农立国,重乎实际而崇尚道德。周公等深刻反思历史,制礼作乐,建构一系列典章制度,使中国“走出了神的阴影,脱离了神话时代,进入了民本主义的历史时代”^{[45]19}。孔子曰:“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八佾》)孔子追崇周公克己复礼,故出于一

种文化自觉而积极改造黄帝形象。孔子“述作”黄帝的重大历史意义主要有两点。

其一,立足于儒家宗法观念,将黄帝塑造为华夏民族的始祖,体现了“天下一家”的民族整体认同观。归纳《五帝德》孔子之言:黄帝,“少典之子也”;颛顼,“黄帝之孙,昌意之子也,曰高阳”;帝喾,“玄嚣之孙,蟠极之子也,曰高辛”;帝尧,“高辛之子也,曰放勋”;帝舜,“蟠牛之孙,瞽叟之子也,曰重华”;禹,“高阳之孙,鲧之子也,曰文命”等,结合《帝系》篇所载,“颛顼产穷蝉,穷蝉产敬康,敬康产句芒,句芒产蟠牛,蟠牛产瞽叟,瞽叟产重华,是为帝舜,及产象,敖”^{[8]126},可列出以“黄帝”为中心的五帝世系表:



又据《帝系》云:“帝喾卜其四妃之子,而皆有天下。上妃有邠氏之女也,曰姜原氏,产后稷;次妃有娥氏之女也,曰简狄氏,产契;次妃曰陈隆氏,产帝尧;次妃隤瞽氏,产帝挚。”^{[8]10}可列出以帝喾为中心的4代世系表:



经过孔子及其后学对古圣王事迹的整理,颛顼、帝喾、尧、舜、禹等古圣王与夏、商、周三代,皆成为黄帝后裔。因此,裘锡圭认为《五帝德》和《帝系》,“是今天所能看到的集中反映以黄帝为始祖的大一统帝王世系的最早作品”^{[46]26}。显然,孔子之论是牢牢建立于血缘宗法制的理念之上,具有鲜明的儒家特色。《礼记·大传》曰“礼,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1]1349};《礼记·丧服小记》亦曰“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1]1298}。《国语·鲁语上》《礼记·祭法》皆载有虞氏、夏、商、周四代禘、郊、祖、宗所配之祖,如《祭法》云:“有虞氏禘黄帝而郊喾,祖颛顼而宗尧。夏后氏亦禘黄帝而郊鲧,祖颛顼而宗禹。殷人禘喾而郊冥,祖契而宗汤。周人禘喾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1]1783}与孔子“述作”五帝世系基本一致。其中有虞氏“祖颛顼而宗尧”、夏后氏“祖颛顼而宗禹”、殷人“祖契而宗汤”、周人“祖文王而宗武王”的庙制,也与孔子传述密切相关^①。“国之大事,在祀与戎”^{[10]1911},“礼有五经,莫重于

祭”^{[1]1685},先民最重祭祀且有着严格的规定,其一就是反对淫祀。孔子尝曰“非其鬼而祭之,谄也”。《左传》僖公十年(公元前650年),狐突曰“神不歆非类,民不祀非族”^{[10]1801};三十一年(公元前629年),宁武子曰“鬼神非其族类,不歆其祀”^{[10]1832}。《曲礼下》曰“非其所祭而祭之,名曰淫祀。淫祀无福”,郑玄注:“妄祭,神不飨。”^{[1]204}因此,孔子的“述作”具有相当高的历史可信度。孔子对“黄帝四面”的“述作”,亦具有历史发展的背景。闻一多指出:“在国家形态出现以后,便是一个共主统治着四方的诸侯,黄帝立四面的传说,便是由此而起的。”^{[47]88}所谓“黄帝取合己者四人,使治四方,不谋而亲,不约而成,大有成功,此之谓四面也”,即将黄帝视为天下之共主。

其二,依据道德文化和历史功绩,将黄帝塑造为理想的古圣王,为后世君主树立治国、安天下之榜样。孔子于《五帝德》介绍五帝,重点评介其道德与功绩。与之相似,《虞戴德》记载鲁哀公问曰:“昔有虞戴德何以?深虑何及?高举安取?”孔子则认为,为君除了取法虞舜以降四代之德,更应思慕黄帝之道:“君以闻之,唯丘无以更也;君之闻如未成也,黄帝慕修之。”^{[8]173-174}孔子追慕黄帝等古圣王之道,可以其畅谈“大同”为证:“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郑玄注曰:“大道,谓五帝时也。”孔颖达疏曰:“自‘大道之行’至‘是谓大同’,论五帝之善……今此经云‘大道之行也’,谓广大道德之行,五帝时也。”^{[1]874-877}“大同”遂为理想社会之代名词,五帝遂为圣王之样板。总结孔子所言可知,黄帝为“大同”的开创者,至虞舜则为“大同”之衰落,故黄帝代表着儒家理想的最高境界。《庄子·盗跖》曰“世之所高,莫若黄帝”^{[3]997},正是出于对黄帝崇高无上之历史定位的普遍认同。《礼记·祭法》曰:“有虞氏禘黄帝而郊颡,祖颡而宗尧。”孔颖达疏曰:“祖,始也,言为道德之初始,故云‘祖’也。宗,尊也,以有德可尊,故云‘宗’。”^{[1]1784}依据道德文化、历史功绩为标准来阐释“祖”“宗”之内涵,实为儒学的一种传统。

四、结语

孔子“述作”黄帝形象,既有宗法血缘的视角,又有道德与历史功绩的考量。就存世文献看,视黄帝为华夏民族的最重要的始祖、黄帝时代为“大同”理想的最早源头,皆源于孔子之“述作”。沈长云运用

马克思主义民族形成理论,结合传世与出土文献论述了华夏民族起源与形成的特殊历程,认为在春秋战国之际,“以华夏为首的我国中原各古老部族已走完了自己的历程,由它们共同融铸成的华夏民族,已以其崭新的姿态出现在世界的东方”^[48]。所论与孔子对黄帝形象的“述作”在时间与内容上均趋于一致。姜广辉指出:“‘述’是述其历史,‘信’是珍视历史中内含的价值观,这种价值观是经受了历史检验的,它比现实中那种人为造作的价值观更可靠。”^{[49]65}孔子对黄帝形象的“述作”,其重大意义即在于此。

孔子确立黄帝古圣王与华夏始祖的历史形象影响深远,直接影响到司马迁《五帝本纪》的写作。司马迁认可孔子及其后学所“述”五帝的历史真实性,并深刻认识到孔子“述作”黄帝对建构华夏民族古史的积极意义:“学者多称五帝,尚矣。然《尚书》独载尧以来;而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荐绅先生难言之。孔子所传宰予问《五帝德》及《帝系姓》,儒者或不传。……予观《春秋》《国语》,其发明《五帝德》《帝系姓》章矣,顾弟弗深考,其所表见皆不虚。”张守节《正义》:“太史公依《世本》《大戴礼》,以黄帝、颡、帝、唐尧、虞舜为五帝。”^{[4]1}王聘珍认为《五帝德》《帝系》“二篇皆在《礼记》二百四篇之中,与《古文尚书》等经同出孔壁”,系“七十子后学者纪录旧文”(《目录》)^{[8]5-6}。皆指出《五帝本纪》是对孔子及后学“述作”黄帝古圣王与华夏始祖形象的继承,并将该形象固化在历史的叙事之中。所谓“百家言黄帝”,自然包括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徐旭生说:“关于传说时代的前期,我们所保存的资料,从现在看来,当以见于《大戴礼记·五帝德》篇及《史记·五帝本纪》篇中所记的五帝为比较可靠。”^{[50]37}也高度肯定了孔子对五帝的“述作”与司马迁对五帝的立传所具有的重要历史意义。所谓“自孔子以前数千年之文化,赖孔子而传;自孔子以后数千年之文化,赖孔子而开”^{[9]263},由孔子“述作”黄帝亦可见一斑。

注释:

① 《孔子家语·庙制》载:子羔问曰:“《祭典》云:‘昔有虞氏祖颡而宗尧,夏后氏亦祖颡而宗禹,殷人祖契而宗汤,周人祖文王而宗武王。’此四祖四宗,或乃异代,或其考祖之有功德,其庙可也。若有虞宗尧,夏祖颡,皆异代之有功德者也,亦可以存其庙乎?”孔子的回答是:“善,如汝所闻(问)也。如殷周之祖宗,其庙可以不毁,其它祖宗者,功德不殊,虽在殊代,亦可以无疑矣。”参见王肃注:《孔子家语》卷六,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65页。

参考文献:

[1] 礼记正义[M].郑玄,注.孔颖达,正义.吕友仁,整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2] 余纪元,金小燕,韩燕丽.“述而不作”何以成就孔子?[J].孔子研究,2018(2):13-20.

[3] 郭庆藩.庄子集释[M].王孝渔,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61.

[4] 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59.

[5] 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

[6] 顾颉刚.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M]//顾颉刚.古史辨:第1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7] 高强.炎黄学的文献依据[J].信阳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39(1):98-103.

[8] 王聘珍.大戴礼记解诂[M].王文锦,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3.

[9] 柳诒征.中国文化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10] 春秋左传正义[M].杜预,注.孔颖达,疏.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M].北京:中华书局,1980.

[11] 孔广森.大戴礼记补注[M].王丰先,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13.

[12] 余明光.黄帝思想与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的渊源关系[C]//徐炳主编.黄帝思想与先秦诸子百家:第2卷上[C].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

[13] 杨伯峻.列子集释[M].北京:中华书局,1979.

[14] 贾谊.贾谊集校注[M].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10.

[15] 尸佼.尸子[M].汪继培,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16] 刘安.淮南子集释[M].何宁,集释.北京:中华书局,1998.

[17] 银雀山汉墓竹简整理小组编.银雀山汉墓竹简·孙子兵法[M].北京:文物出版社,1976.

[18] 王小盾.经典之前的中国智慧[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

[19] 袁珂.山海经校注[M].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3.

[20] 陈鼓应.黄帝四经今注今译:马王堆汉墓出土帛书[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

[21] 高至喜.商代人面方鼎[J].文物,1960(10):57-58.

[22] 饶宗颐.道教与楚俗关系新证:楚文化的新认识[C]//饶宗颐史学著作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23] 高强.炎黄二帝与儒家道统[J].孔子研究,2018(6):130-138

[24] 徐元诰.国语集解[M].王树民,沈长云,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02.

[25] 王先慎.韩非子集解[M].钟哲,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7.

[26] 尚书正义[M].孔安国,传.孔颖达,疏.北京:中华书局,1980.

[27] 吕不韦.吕氏春秋校释[M].陈奇猷,校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28] 傅亚庶.孔丛子校释[M].北京:中华书局,2011.

[29] 顾颉刚,刘起釭.尚书校释译论[M].北京:中华书局,2005.

[30] 许慎.说文解字注[M].段玉裁,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

[31] 世本八种[M].宋衷,注.秦嘉谟,等辑.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8.

[32] 论语注疏[M].何晏,集解.邢昺,疏.北京:中华书局,1980.

[33] 孔子家语[M].王肃,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

[34] 周礼注疏[M].郑玄,注.贾公彦,疏.北京:中华书局,1980.

[35]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M].北京:中华书局,2018.

[36] 刘熙.释名[M].北京:中华书局,1985.

[37] 祥雍.古本竹书纪年辑校订补[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

[38] 李学勤,张岂之.炎黄汇典·史籍卷[M].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2.

[39] 王中江.根源、制度和秩序:从老子到黄老[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

[40] 郑樵.通志二十略[M].王树民,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95.

[41] 唐兰.中国文字学[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42] 黄怀信.孔子形貌考[C]//贾磊磊,杨朝明.第四届世界儒学大会学术论文集.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12.

[43] 欧阳询.艺文类聚[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

[44] 鲁迅.中国小说史论[M].鲁迅全集:第9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45] 彭林.礼乐文明与中国文化精神[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

[46] 裘锡圭.中国出土古文献十讲[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

[47] 闻一多.伏羲考[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48] 沈长云.华夏民族的起源与形成过程[J].中国社会科学,1993(1):175-188.

[49] 姜广辉.新经学讲演录[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0.

[50] 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增订本[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

(责任编辑:赵 婧)